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——反抗日本侵略、反对分裂祖国的革命壮举

文/《内蒙古日报》记者 吕学先

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。

春寒料峭,青山肃穆。在包头市达茂旗艾不盖河南侧的女儿山上,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亲笔题写的“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”12个金色大字在太阳的照射下,光芒四射,熠熠生辉。

1986年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50周年之际,为缅怀革命先驱的英勇事迹,弘扬革命精神,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决定在百灵庙女儿山上修建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碑。1989年,纪念碑在达茂旗百灵庙镇女儿山顶建成。碑呈方锥形,高20米。纪念碑塔基上用大理石构筑的方形粗线条抗日战士浮雕“群英图”,战马腾空,战士威武,体现了抗日武装队伍勇往直前、奋勇杀敌的光辉形象。

山下的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纪念馆正在重新布展。负责人介绍说,作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包头市党性教育基地,这里每年平均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、学生及各界群众2万多人前来祭奠先烈,接受爱国主义教育,使党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。

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,发生于1936年2月21日,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加快实施侵略中国步伐、扶持极个别蒙古封建王公图谋分裂中国的危急关头,在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乌兰夫的领导下,由云继先、朱实夫、云蔚率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保安队千余名爱国官兵,反抗日本侵略、反对德王分裂祖国的革命壮举。1935年冬,鉴于德王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已有紧锣密鼓之势,乌兰夫两赴百灵庙,开展抗日救亡宣传。他以土默特旗教员的身份与德王进行了面谈,摸清了德王投日心意已决。乌兰夫即指示云继先、朱实夫、赵诚、云蔚等人:德王投靠日本,一旦德王公然在日本的操纵下搞起独立运动来,我们暴动的时机就成熟了。1936年2月10日,德王在其王府成立伪“蒙古军总司令部”,改元易帜,设置日军顾问部,其叛国投日的心迹已化为行动。18日,云继先、朱实夫按照乌兰夫指示,与云蔚紧急磋商,决定于2月22日23时30分举事,后为防止意外,又提前至21日23时30分。

1936年2月21日晚10时,云继先、朱实夫、云蔚指挥暴动的官兵根据预先策划的暴动计划,分6路行动:一路警戒德王的袍子队,以保障暴动顺利进行;一路到南营盘,占据下山通道;一路攻打蒙政会稽查处和看守所;一路去德王设在大庙的军械库夺取武器;一路强占并捣毁蒙政会的电台,切断蒙政会与德王府的联系;一路到蒙政会机关说服动员文职官员支持和参加暴动队伍。

云继先和朱实夫带领一路人马直奔南营盘去解决新兵大队的问题。很快就按计划把新兵大队拉到河滩,待打开军械库后去领取武器,同时留下所有伙夫,为暴动部队准备早饭。云蔚指挥一部人马秘密接近蒙政会稽查处,枪毙了稽查处处长李风诚,释放了看守所关押的士兵,向他们讲明了保安队暴动、脱离德王、走抗日道路的大意。随后,云蔚来到蒙政会文职官员住的地方,把大家集合起来,宣布了暴动的决定。夺取军械库的部队智取军械库后,派人给云继先送了信,云继先迅速带领新兵大队到军械库。攻打电台的部队见到报务员已闻讯逃跑,便将电台所在的蒙古包内的箱柜砸个稀烂。但因士兵不认识电台,未将电台毁坏,待他们离开之后,报务员便返回利用电台向德王府报告了情况。

凌晨2时,完成任务的各路部队在南营盘集合,云继先将暴动队伍编为一个大队、两个分队,自任大队长,朱实夫担任副大队长,两个分队均指定了负责人。4时,云继先带领暴动队伍离开百灵庙,向东南方进发。当暴动队伍行至黑沙图时,遭到德王派来的袍子队骑兵的追袭。暴动队伍与袍子队激战近6小时,击退追兵。当天,保安队二中队队长陈应权根据云继先事先安排,将驻在乌拉特中旗的二中队带到武川二份子会合。两部分暴动人员会齐后,暴动队伍达到1100多人。部队合编为一个总队,下设六个中队,两个特务队。合编完毕后,暴动部队就地等待傅作义派出的汽车队接应。不久,绥远省政府将暴动部队编为“绥境蒙旗保安总队”,任命云继先为少将总队长,朱实夫为上校副总队长。

1936年2月25日,云继先领衔向全国发出通电,揭露德王投靠日本的行为,声明脱离百灵庙蒙政会。百灵庙抗日武装暴动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扩张野心,迟滞了日本侵略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计划,鼓舞了全国人民御侮救亡的斗志。

奋斗百年路·启航新征程

《新青年》唤醒新青年

文/新华社记者 黄 玥

106年前,一本名叫《青年杂志》(后改名《新青年》)的书刊在上海创办,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,在中国革命史的地位举足轻重。

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的变化令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,要救中国,首先要进行思想革命。救亡图存的希望在青年,而青年的希望在先进的思想。《新青年》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。

中央档案馆收藏着这本难得一见的创刊号。这份杂志版面16开本,封面设计引进了西方美术和印刷先进技术,格外醒目。

杂志上半部为一张长方形图片:一群并肩而坐听课的青年,图片中标有法文刊名“LA JEUNESSE”,为“青年”之意。

发刊词《敬告青年》写道:“青年如初春,如朝日,如百卉之萌动,如利刃之新发于硎,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。青年之于社会,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……”

青春有为、奋发昂扬的气息,跃然纸上、扑面而来。

一年后,《青年杂志》更名为《新青年》。李大钊发表《青春》一文,大声疾呼:以青春之我,创建青春之家庭,青春之国家,青春之民族……

伴随着销量飙升,并且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、反对封建伦理道德、呼唤人性的觉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,《新青年》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,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,对一代中国青年的影响更是无法估量。

当时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,后来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谈到《新青年》:“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,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。我特别爱好胡适、陈独秀的文章。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,一时成了我的模范。”

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“新声社”恽代英等人在给《新青年》的信中写道:“我们素来的生活,是在混沌的里面,自从看了《新青年》渐渐的醒悟过来,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。”

《新青年》杂志的文章及后来的五四运动,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。《新青年》崇尚的自由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等历史命题,让无数爱国青年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巨大能量,开始了救国复兴之路的艰辛探索。

五四运动两年后,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,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仅为28岁。

百余年来,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日夜兼程,用奋斗凝聚起一个活力四射的青春中国。

恩格斯说,青年的性格就是时代的性格。

一百多年前,民穷国弱,山河破碎。无数优秀青年饱怀爱国主义、与时俱进的精神,为建立一个独立、自由而强大的中国,贡献青春与汗水,乃至抛头颅、洒热血。

如今,建党百年之际,已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,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。

青年一代有理想、有担当,国家就有前途,民族就有希望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,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、创造历史。

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